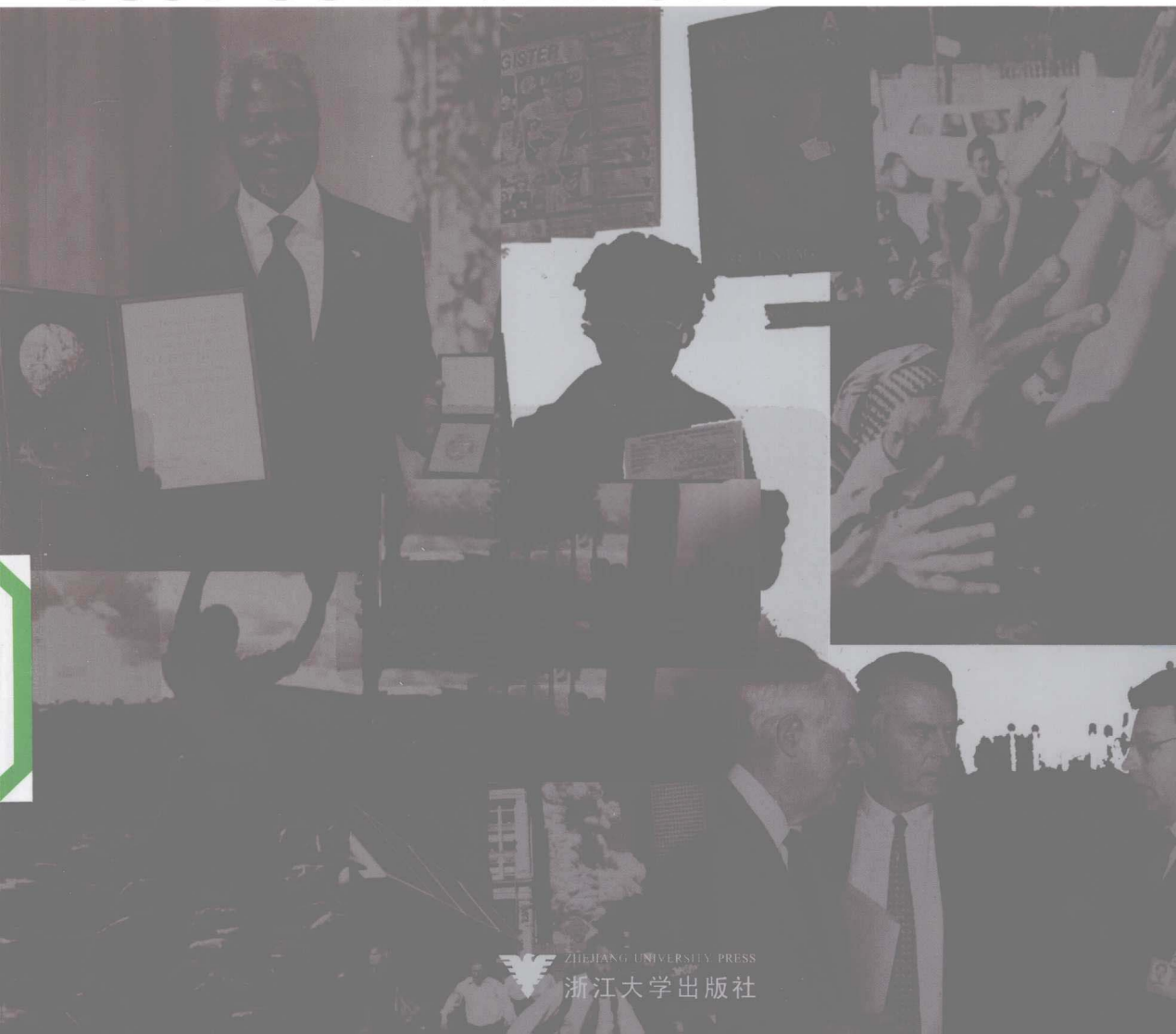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一个单身女人来敲门。
她对我说：“我是塞尔维亚族人，我的邻居是穆斯林。”
她看着我的眼睛请求道：“请不要让我们自相残杀。”

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 (Frederic Eckhard) 著
J. Z. 爱门森 译

冷战后的联合国

POST-COLD WAR U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冷战后的联合国

POST-COLD WAR UN

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 (Frederic Eckhard) 著

J. Z. 爱门森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的联合国 / (美) 埃克哈德著; 爱门森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308-07627-2

I. ①冷… II. ①埃… ②爱… III. ①联合国—研究

IV. ①D81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9741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0-41

冷战后的联合国

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 著

J. Z. 爱门森 译

责任编辑 李海燕

装帧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20 千

版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7627-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前言

我为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做了八年半的新闻发言人，跟随他去过近一百个国家；而到了退休的年纪，我却只是对中国念念不忘。我并不打算在中国过我的退休生活——我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已经在法国北部一个很美丽的小镇安了家——我只是想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体验。浙江大学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非常感谢。

2006年我们在浙大呆了四个月，浙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带着我们融入这里的生活中，让我们感觉到家一般的亲切。凌建平(James)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也是浙大的校友。在我退休之前，他主动来到我的办公室为我提供帮助。他几乎为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事——甚至包括为我们在杭州选好住处，并亲自赶到那里帮助我们收拾安顿下来。他和他的妻子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朱晓云，我们都管她叫小朱，个子小巧而心地开阔。作为浙大的人才引进办公室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她总是随叫随到，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对她真是很感谢。

说到我的教学工作，浙江大学为我安排了一位合作教授J. Z. 爱门森(赵晶晶)。她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教授。她的丈夫是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教授；她本人也曾在那里教书。她创办了英文学术刊物《中国传媒研究》(China Media Research)，往来于太平洋两岸，在美国与中国均分其时间，很有能力和魄力，没有她的大力支持，我们是无法做到现有的一切的。也正是因为她，我才有了翻译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她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多方接洽，才使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我很幸运，我还有张园、叶芳、陈姗姗这几位非常出色的助教，她们什么都会做，而且几乎是有叫必应的。

因为我的这门课“冷战后的联合国”有350个学生，一共要上八次；而且每次课都要持续近三个小时。所以我把每次上课的时间分为三部分：我先讲一个小时的课——讲课的内容都收在这本书中，我或多或少地念给学生听。他们对逸闻轶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者，我能与学生们分享的原创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至于有关



历史的内容,我倚重于两位朋友——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和斯坦利·麦斯勒的著作。他们的著述和其他相关材料全都列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

在第二个小时中,我会播放我采访“历史见证人”的录音。这八次采访或者说交谈都是用来进一步说明各课的主题的。播放录音的时间会持续 25 分钟(——诸如科菲·安南的访谈)至一个半小时(——诸如布莱恩·厄克特爵士的访谈)不等。在课堂上,因为时间关系,我曾适当地对录音文件做了一些编辑,不过在这本书中,我收录了全部的原始录音转写材料。并且,在成书之前,我曾让每一位被采访者对各自的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核实修正。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在核实修正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被删改。

在课堂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是留给大家提问的:由于我的学生们思维活跃,参与意识很强,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

我才从联合国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不久,这么快就要让我回顾邪恶——我的工作曾要求我不得不面对过许多糟糕的事情,像波斯尼亚战争,卢旺达种族屠杀,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被炸等等——把我在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间以较为通俗的方式写出来,对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感到压力很大。在杭州的时候,我曾有过三次很小型的中风。每次生病,小朱都会送我去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我得到了多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们的精心照顾,所以我一次课都没有落下。谢立平医生(Xie Liping)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医生还与其他医生做英语翻译。护士长王微(Wang Wei)则在其支持下鼓励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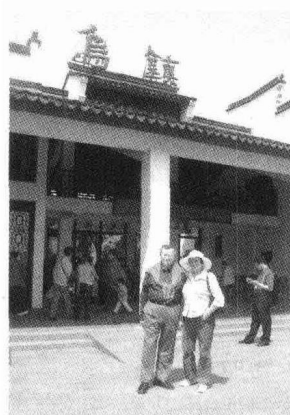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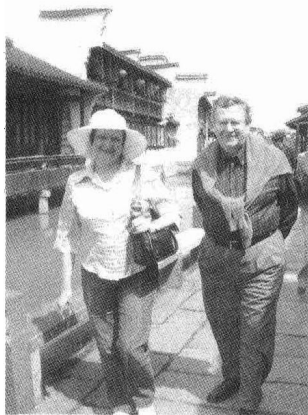


图 0-1a、0-1b 我和妻子凯瑟琳在浙江乌镇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杭州市是很大的;但杭州的中心——环西湖区域像一个小村落。我和凯瑟琳徜徉其间,从湖畔到山顶,从屈曲回廊到林间小径——我们发现自己已

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们都很期待着回到西湖的清山秀水之间。



图 0-2 凯瑟琳在杭州西湖

最后,请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其负责人接受我诚挚的感谢。

弗雷德·埃克哈德 (Fred Eckhard)
法国,圣奎伊泊垅 (Saint Quay-Portrieux, France)



绪 论

2006年2月20日,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仪式,欢迎弗雷德·埃克哈德(Fred Eckhard)先生成为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埃克哈德先生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如下:

校长先生,副校长先生,各学院、各部门的领导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首先,衷心地感谢潘校长,让我有幸成为浙江大学的客座教授。感谢您对我的赞誉,您实在太过奖了。这是一个如此隆重的仪式,以至于我觉得我需要克制着才不向各位尊敬的先生和女士们请教:你们确认不会搞错了吧?你们知道,我并不是科菲·安南,我只不过是他的发言人。

今天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1997年科菲·安南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最初去海外考察阶段中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应邀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他被请到了台上,当他开始演讲的时候,他的实况转播图像出现在其身后的巨型电视屏幕上,图像把他放大了十几倍。安南中断了他的演讲,转过身去,不太自然地看那幅图像。然后转回来对观众们说道:“天哪,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



埃克哈德先生和潘云鹤校长(2006年2月20日)

我可以愉快地说,虽然安南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担任政治要职,并且游走于战火纷飞的战地前沿,但是,根据我的判断,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谦逊和正直。能够在



2005年6月退休之前的8年半时间里,担任他的发言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一直梦想教书育人。事实上,我一直在思念着杭州。在2002年的时候,我陪同安南来过杭州。在浙江大学,安南就艾滋病问题发表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说。抑制艾滋病传播是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关注和亟需处理的问题之一。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安南更是将中国视为控制艾滋病病毒全球蔓延的重要阵地。安南不仅在杭州得到了盛情款待,而且他觉得,他关于抑制艾滋病的呼吁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和传播。随后安南去了北京,与当时还是副主席的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我也随同参加了那次会晤。在那次会晤中,胡锦涛主席主动提出了关于艾滋病的问题,并且对如何在中国处理这一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会晤的结果是:在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那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握手的画面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这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政治信号,标志着中国将开始推进新的、更全面的艾滋病抑制政策。此政策在2003年12月,由温家宝总理正式宣布。这一举措赢得了广泛的——尤其是来自彼得·皮奥率领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赞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中国在实现联合国国际会议所定目标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一直具有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不断地调整机构运转以实现既定目标。安南对此也非常赞赏,我在许多场合中,都曾听到他对别人如是说。

让我们重新回到2002的杭州之行上来吧。我记得我们是在晚上到杭州的。我不清楚你们是否知道发言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坦率地说,那根本不叫生活。我四处奔忙,想方设法连接因特网,然后为秘书长收集和下载最新的新闻,从而保证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新闻一览无余,高屋建瓴。我每天至少做三次这样的工作。我拿着录音机,追着他跑,这样的话,如果他停下来和记者说几句话,我就可以把它们录下来。然后我把录音整理出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回我的办公室,在那儿,这些内容会被放到英特网上。我跑得是那么地快,而他的官方访问时间又是那么地短,生活像旋风一样,去过的地方也难以记完全。比方说,几年前,我们进行了一次五国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名字都是以“斯坦”结束的。直至今日,我仍然只能记起其中的四个国家名称。可杭州却如此让人难忘。当年在杭州我们就住在西湖边,那时我必须从一间设置好电脑的客房,跑相当的路到秘书长住的另一间客房。黑暗中我在这条路上往返穿梭,不同寻常的是,我注意到了湖边那一排排可爱的树木。那是一个明净的夜晚,月亮在湖面上洒下皎洁的银光。我看到远处,一只小小的老式的船悄无声息地从水面缓缓划过。我停了下来,出神地看着。我看到远处的湖岸上有一座宝塔,宝塔的后边是一抹最可爱的山峦……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告诉我自己,这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后来与外交部官员谈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在说:“我退休了以后想到杭州来教书。”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在2005年4月的时候满62周岁,但是安南希望我呆到6月再走。退休前安排了退休聚会和退休采访。其间,新华社驻联合国通讯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想采访我。采访中他问我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当我说我想来杭州教书的时候,他瞠目结舌。我想这个故事可能在中国流传得挺广,因为接下来就是我和浙江大学的代表商谈并签署了合同,就这样,我来到了这里。

来浙江大学后,我发现这里的人们称呼我为“教授”,而今天潘校长更是将这个称呼正式化、官方化了,现在我是一个客座教授了——尽管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教授。我只是一个发言人,而且还得说我曾经是个发言人。一个教授需要花多年的时间潜心积累某个学科的深厚知识,然后在解析这些知识的基础之上,传授这门学科。但是身为一个发言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忙于奔波,而几乎无暇思考。

当我在准备浙江大学的课程时,我才开始关注这么多年来我对新闻媒体所说的话的历史背景。我开始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而这可是自我学生时代而来的首次。这是一次深深令人欣喜的美妙经历,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希望现在能将我对联合国的了解和知识,与你们学生分享。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会在这里教授两门课程:一门是关于怎样做新闻发言人,主要面向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另一门是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是全校性的选修课,面向全校学生。

校长先生,我希望濡染我的传播学学生们的一个理念是“尊重事实”。尽管我在做出了这个高尚宣言后还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如何界定“事实”的问题上,也还有些哲学方面的疑惑。不过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或许“事实”这个词也可以这么解释。有太多的政治领导者犯下了试图掩盖坏消息的错误。但是,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互相连动的世界里,最好的建议就是说出事实——快速地说出,并且由你自己来说。事实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助手就曾经写过一本类似标题的书,说的是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丑闻中由于没有及时充分地说实话从而使他的总统地位岌岌可危。

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这门课程,校长先生,我不得不承认这门课对我来说有些难度。我1985年加入联合国,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但是经历历史和理解历史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阅读了大量由真正的教授们撰写的书,也由此对这近20年来的纷繁复杂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将试着与我的学生们分享我的



新发现。

先生们、女士们：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搞懂。在联合国任职的 20 多年时间里，我向媒体报告了许多糟糕的事情：柬埔寨、卢旺达和苏丹的种族灭绝，许多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还有现在面临的全球冰层融化问题。当我回顾 20 世纪促成联合国成立的种种事件时，情况就更糟糕了，其中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将会是核战争。我向我的学生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会是：“是什么使人类本性如此残酷和富有攻击性？”不过很抱歉，我自己也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我重返课堂，不过不是以学生的身份，而是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但是先生们，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请别叫我教授，叫我 Fred 就可以了。

再次谢谢您，校长先生，感谢您今天下午授予我的荣誉，也感谢您提供我在这个杰出大学教学的机会。我希望我不会令你们失望。



目 录

第一讲 他们在骚乱非洲

Lecture 1: They're Rioting in Africa / 001

第二讲 冷战使联合国陷入“飞速的”停滞(是这样吗?)

Lecture 2: The Cold War Gets the UN Off to a Flying Stop(Or Does It?) / 041

第三讲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和解冻的开始

Lecture 3: Javier Perez de Cuella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haw / 086

第四讲 纳米比亚和综合维和

Lecture 4: Namibia and Complex Peacekeeping / 116

第五讲 并非那么新的“新世界秩序”

Lecture 5: The Not-So-New World Order / 150

第六讲 前南斯拉夫:欧洲与联合国为和平共同努力

Lecture 6: Former Yugoslavia: Europe and the UN Work Together for Peace / 181

第七讲 石油换食品:丑闻还是成就?

Lecture 7: Oil for Food: Scandal or Success? / 217

第八讲 科菲·安南与联合国改革:联合国还有未来吗?

Lecture 8: Kofi Annan and UN Reform: Does the UN have a Future? / 255



第一讲 他们在骚乱非洲

Lecture 1: They're Rioting in Af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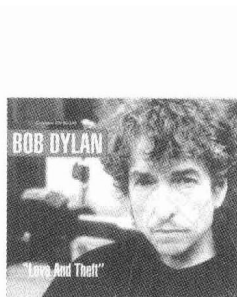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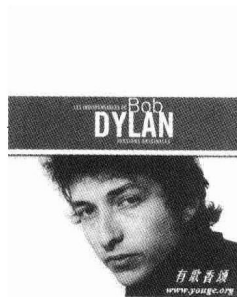
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曾像你们这样年轻——我常常跳一种摇摆舞。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迷恋的是比尔·哈利(Bill Haley)和他的彗星合唱团,他们的成名曲是《昼夜摇滚》(*Rock Around the Clock*)。后来流行的又是更为深情的节奏布鲁斯。



见图 1-1a、1-1b 比尔·哈利和彗星合唱团



等我们上了大学,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为成熟的音乐。于是兴趣又转向乡村音乐。我们喜欢鲍勃·迪伦(Bob Dylan)、琼·贝兹(Joan Baez)的歌,有些人甚至喜欢莱特宁·霍普金斯(Lightnin' Hopkins)那粗嘎喉音的哀伤调子。



见图 1-2a、1-2b 鲍勃·迪伦(Bob Dylan)

图 1-3a、1-3b 琼·贝兹(Joan Baez)



图 1-4a、1-4b 莱特宁·霍普金斯(Lightnin' Hopk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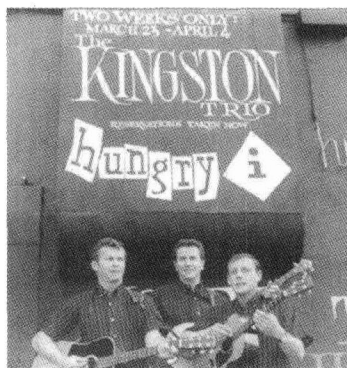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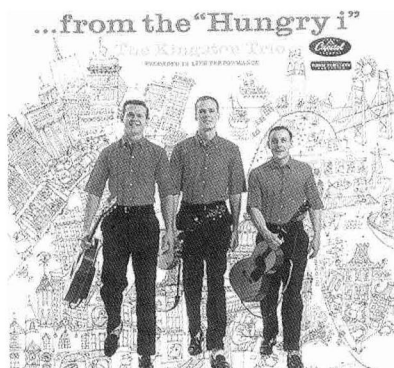
我记得当时美国生活的主题是人权,尤其是黑人的选举权问题;有些州不让黑人参加选举。我有些同学甚至从当时我们念书的波士顿赶往南方的阿拉巴马州或密西西比州,参加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

悬在头顶的另一件大事是核毁灭的威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到后来上大学,我们就一直非常真切地感觉到一种恐惧:美国与苏联间随时可能展开毁灭世界的战争。

虽然我们曾在那些年里不只一次地与世界末日靠得很近,但毕竟最终灭顶之灾没有发生。后来我进入一家成立于 1973 年、名为“联合国协会”(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的非赢利性机构工作。这个协会有一本内部刊物叫做《互依共存》(*The Inter Dependent*),专门报道联合国如何处理环境、发展及核扩散等全球问题。我为这本刊物做了十二年的编辑;然后我进入联合国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并最终成为一名联合国发言人。作为一名发言人,我的办公室虽然在纽约,可是我也在纳米比亚呆了一年——那可是在非洲西南部;然后 1992 年在萨拉热窝,我经历了成为联合国发言人后的第一次战争。

1997 年,我受命成为科菲·安南的发言人,这开始了我八年半奔波不定的生活。当我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都接近极限时,我要求退休了。

当我开始收拾东西时,大学时代的另一首歌在我耳边响起。这首名叫《欢乐小步舞曲》(*Merry Little Minuet*)的歌是一首有点傻呵呵的像口水歌似的乡村歌曲,是由一个叫做金士顿三重唱(Kingston Trio)的组合演唱的。



见图 1-5a、1-5b 金士顿三重唱

这首歌的第一句就唱道：“他们在骚乱非洲。”我有一盘金士顿三重唱在旧金山举办演唱会的磁带，当他们唱到这一句时，观众中发出一阵窃笑。

然后他们接着唱道：

“西班牙饿殍遍野，
佛罗里达飓风肆虐，
而德克萨斯赤地千里。”

此时观众开始哄笑起来。

“整个充满不幸灵魂的世界正在溃烂。

法国人憎恨德国人，德国人憎恨波兰人；

意大利人憎恨南斯拉夫人，南非人憎恨荷兰人。

而我谁都不喜欢……”

此时，观众中爆发出大笑。

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怎么都笑不出来。它让我想到三十年来我面对的那些仇恨、饥饿与环境灾难。这首貌似有点傻呵呵的口水歌唱的都是极严肃的话题。

然后这首歌继续唱道：

“哦，我们应该安静下来，

心怀感激，充满骄傲；

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大的蘑菇似的云朵。

也许到了某个幸运的日子，



“祥光一闪,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笑声更大了。

歌的最后一段唱道:

“他们在骚乱非洲,

伊朗战火难息。

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

此时,观众们笑得声音都粗嘎了。他们笑得越厉害,我就觉得越悲哀。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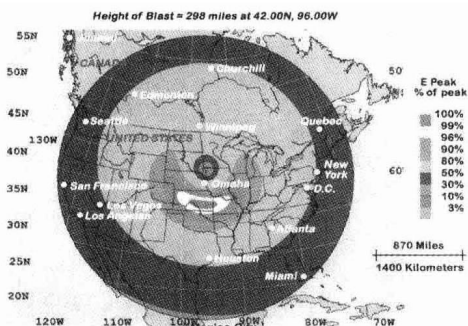
在我做发言人的那么多年里,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些什么呀! 卢旺达种族灭绝,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萨拉热窝日日不断的轰炸,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的种族清洗,摩加迪沙的巷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无休无止的谋杀,苏丹达尔富尔的大规模强暴,东帝汶的毁灭性杀戮与破坏,印度洋海啸造成的巨大灾害,艾滋病时时带来的可怕死亡,还有全球变暖给全人类带来的威胁……“我们会对自己做一些大自然都不会对我们做的事”,对我来说,歌中唱的一切都无比真实。

这首歌写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也就是说,写于冷战期间。现在对你们来说,冷战似乎只是一段历史。柏林墙的倒下意味着冷战的结束,这已经是 17 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你们大概才一两岁大。你们没有真正地看到这段历史。但是冷战真实地影响了你们父母一辈的人生,也影响了我的人生。

核威胁 The Nuclear Threat

“祥光一闪,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我们小时候,这种念头每天都会出现在脑子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经常练习如果苏联向纽约投放原子弹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得全部躲到课桌下面,用双臂抱住头。



见图 1-6:核弹力量范围的同心圆

当时的报纸曾刊登过一张很大的图片。图片显示如果纽约遭受核弹袭击,从袭击中心向外的波及范围会有多大。

最中心的一个圆圈里的一切都将摧毁。我们所在的小镇离时代广场仅 12 英里。我们就在这最中心的圆圈里!如果核弹落在曼哈顿,我们都会是一个个煎炸了的小小孩子。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既然我们都会被炸成焦炭,那我们还需要用双臂抱住头做什么。

对死亡的恐惧深深地植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你可以在金士顿三重唱的歌里听到这种恐惧的反应:

“我们就都被炸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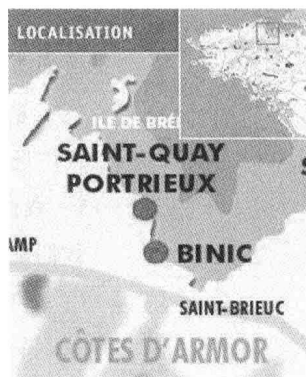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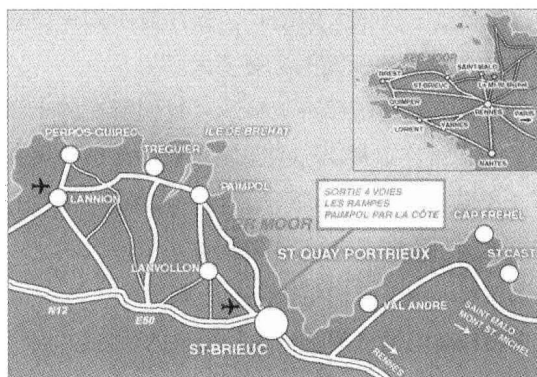
两次世界大战 Two World Wars

你们都知道,我从联合国发言人的职位上退休是 2005 年 6 月底的事。然后到了 9 月份,我和妻子就搬到了法国。这次搬家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金士顿三重唱的那首歌是现在写的,那么大概会加上“美国憎恨法国”这一句。不过在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曾去巴黎求学一年。法国人留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很喜欢我。那是 1963 年的事了,那也是我生命中最刺激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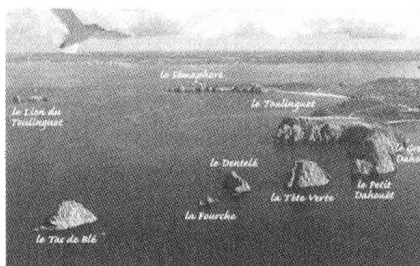
我记得 1963 年的 11 月,我们一帮美国学生在巴黎市中心闲逛,找一家名叫“哈利纽约”的酒吧。我们有点吵闹。街上一个宪兵,也许是警察吧,无意中听到我们说话,于是走上前来问:“你们是美国人?”我们说我们是。“你们没有听说吗?你们的总统遇刺了,他死了。”

我们一下子陷入震惊的沉默。那个宪兵看着我们,很同情地说:“C'est triste pour vous, mais pour nous aussi. (这是你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法国人很喜欢肯尼迪总统。而我们大多数年轻的美国人对他有一种很特别的爱戴。从那天晚上起,我开始喜欢法国人。

我的妻子是英国人,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在巴黎和日内瓦工作。她学习法语,并且非常喜欢欧洲大陆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在欧洲的西北海岸,住在一个只有三千四百人的、叫做圣奎伊泊塘(Saint Quay-Portrieux)的小渔村里。我们过得很开心。在纽约城里过了三十年繁忙与吵闹的生活,我们感到小渔村的这种安静使人愉悦。



见图 1-7a、1-7b 圣奎伊泊塘的地图



见图 1-8a、1-8b 布列塔尼半岛

一个人退休之后就没什么事可忙了,所以我们花许多时间开车在布列塔尼半岛(Brittany)上的各个小村子间到处逛。在这里,天主教的建筑风格仍然占据主要的位置,教堂的尖顶仍然是最明显的标志物。在每个村子的中心、靠近教堂的地方都有一座战争纪念碑。大多数纪念碑上镌刻着本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姓名。名单非常长,姓氏的反复出现意味着同一个家族中有很多人都死于大战。



见图 1-9a、1-9b 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一个碉堡